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系列丛书

找 寻 夏 娃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透视



序

我虽然也是女性，可对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研究却有些隔膜。不过，对于近一二十年来女性文学的蓬勃发展和女性文学研究的兴旺局面还是略有所闻且深受感染的。一大批富有才华的女性作家、女性文学研究家的辛勤创造，不仅显示出现代女性对自己性别的骄傲，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开辟着一个令今人和后人都无法忽视的、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新世界。我深深敬重文学领域中这些女性创造者们——她们那种不同寻常的灵气，不同寻常的艺术智慧，尤其是面对传统樊篱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无畏冲击；当然，与此同时我也深深懂得，身为女性要获得文学事业成功之不易，她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是男性们所难以理解和体验到的。也许正是这种性别心灵的相通，当赵树勤带着她刚完成的书稿来要我为它写篇序言时，我竟毫不考虑这于我的难度就贸然地应允了。

当我比较仔细地读完这部书稿后，我深深感觉到它的分量。尽管在某些观点上，以及全书体例纲目安排上，我可能会保留若干不尽相同的认识，但我不能不由衷地承认：赵树勤对当代女性文学所作的研究是相当全面深入且有着个人特色的。

著作显示出作者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具有整体性的眼光，她力图在十分繁复复杂的女性文学创作现象中把握住它发展的脉络，同时更重于把握住它最值得关注的创作问题，如创作的主题话语、语言特征、理论构建以及中国女性文学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展开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她的研究目光还投射到女性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不同创作类别，通过一些个案的认真剖析，探寻她们创作的独特神韵。这样，就使读者既能全面地又能具体地了解和感受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整体风貌。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和论述的整合力量，在当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中是相当难得的。在整部著作的论述中，我感到更令人欣赏的是作者对女性创作感受的真切和分析的独到。比如，她从性爱、死亡、逃离、爱欲、孕育、言说等六个方面，分析了近一二十年来女性文学创作的主题话语，这种概括从理论上来说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它却是作者从她对女性文学的深切解读中提升出来的，浸润着她个人的独到感悟和理解，因此，它对人们认识女性文学的特有的精神内涵有着一定的启悟意义。特别是她对这些主题话语作具体阐释时，我们更看到了一个女性文学研究者所特有的鲜明的女性视角，这可以从她对女性文本体现的死亡主题的阐释中见出。赵树勤对女性文本中体现的“死亡体验”的解读，是从死亡与性爱关系、死亡与生命孕育的关系来进入的，这既是文本所体现的特殊意味，也可以说是女性研究视角的特殊发现。女性对“死亡是爱的迷醉和伤痛”（马尔库塞语）最敏感，因此，文本中关于死亡与性爱的缠绕的表现特点，也更容易引起女性研究者的敏锐关

注；至于死亡与生命孕育的潜在关系，当然更是女性最能体验到的真理，所以赵树勤在阐释翟永明的诗歌《死亡的图案》、毕淑敏的小说《生生不已》等作品时，是那么充满激情地把只有女性才能真切体验到的将死亡与生命孕育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涵义作出富有深度的阐发。这些都使我感到，用整体性的眼光与女性研究的特殊视角相结合这样的表述来概括这部著作的特色，是有根据的。

从女性文学现状的研究中远瞻其未来走向，自然是作者对自己研究对象理性认识的一种显示。确实，尽管今天新的现实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的闸门，“女性”的旗帜可以自由地张扬，但我总是难以放弃这样的看法：所谓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女性文学等等的说法，始终只不过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一种谋求平等的策略和手段，因而它必然地带有着天然的忧郁情愫和无奈的祈求，哪怕是狂飙式的女权呼喊抑或是明丽媚人的状态呈示，似乎都难以摆脱这种属于本原性的内质。这种状况有时甚至会激起人作出一种“反常”的冥想：何时才能真正结束女性的性别呼喊而真正以一个“人”的姿态显示“人”的自由个性？！赵树勤在她著作的最后，以对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预想，畅述了未来女性、女性文学获得自由天空的可能，我作为女性，当然也盼望她的分析将成为可能。不过，我仍然还是这样敦促自己，无论什么时候，女性的价值和社会位置，是通过她对社会的价值实现来获得的，当她的创造与劳作真正汇进了历史前进的大潮时，谁又能够遮蔽她的天空？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使我觉得，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对于那种显示女性与人类社会的进步事

业、与当今时代的创造热潮声息相通的文学创作，有理由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对于那些只愿向隅于私人领域或沉迷于女性自我躯体与女性欲望宣泄的艺术营造，在给予一定理解的同时，恐怕没有必要由于女性的“相惜”而投以太大的热情。我想，作为对女性文学深有素养的赵树勤，她将会从更高的视点来面对这一切的。

陈美兰

2001年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寓所

目 录

序	陈美兰 (1)
绪 论 女性的浮现与缺席	(1)
第一节 女性文学的内涵	(2)
第二节 女性文学的缘起及其演进轨迹	(4)
第三节 文学史编撰中的女性缺席	(14)
第一章 女性文学的主题话语 (上)	(25)
第一节 性爱：快乐原则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26)
第二节 死亡：生命末日的女性言说	(46)
第三节 逃离：寻找家园的孤独之旅	(67)

第二章 女性文学的主题话语（下）	(81)
第一节 爱欲：“黑暗王国”的欲望舞蹈	(82)
第二节 孕育：生命创造神话	(97)
第三节 言说：话语权的欲求与焦虑	(111)
 第三章 女性文学语言的特征及其衍进	(127)
第一节 男权观念与女性语言的阴柔本色	(128)
第二节 理性反思与女性语言的阳刚追求	(137)
第三节 菲勒斯反叛与感性的躯体语言	(147)
 第四章 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	(161)
第一节 灵魂深处的自我独白	(162)
第二节 用躯体通向激情的门坎	(171)
第三节 敞开生命与倾听语言	(179)
 第五章 女性文学与西方文化	(187)
第一节 当代女性批评与西方女性理论	(188)
第二节 当代女性文学与精神分析学	(200)
第三节 当代女性书写与现代绘画色彩美学	(224)
 第六章 女性守望的诗神	(239)
第一节 女性诗歌的界定及其基本特征	(240)
第二节 翟永明：“黑夜意识”的讲述者	(248)
第三节 伊 蕉：女性生命的激情狂舞	(256)
第四节 陆忆敏：女性心灵的高贵诉说	(264)

第七章 女性飞翔的小说世界	(271)
第一节 女性小说的变奏与交响	(272)
第二节 林 白：女性身体的叙事	(285)
第三节 陈 染：记忆深处的私人生活	(295)
第八章 女性烛照的散文天地	(305)
第一节 女性散文的美学风貌	(306)
第二节 叶 梦：女性生命之谜的探索者	(320)
第三节 斯 好：女性写作困境透视	(327)
结 语 女性文学的发展机遇及其走向	(333)
第一节 知识经济与女性文学的发展机遇	(334)
第二节 知识经济时代女性文学前瞻	(343)
后 记	(351)

绪 论

女性的浮现与缺席

如果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话，那么，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所有人的事情。女性主义批评也被以论书为谋生手段的男人们阅读。没有一个教师能无视女性主义批评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文学批评，特别是男性中心的批评所作出的贡献。

——K·K·鲁思文《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引论》

第一节 女性文学的内涵

20世纪末,女性文学研究崛起为中国文学界显学,女性文学也成为在文学中再抽象后的新的理论范畴。但遗憾的是,女性文学一直未得到必要的界定,以致总是处于一种不无尴尬的“无边”的状态。有人提出女性文学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有人界定女性文学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甚至也有人认为男性作家对女性题材的操作亦可归为女性文学……由此,女性文学成了一个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概念,成了一个一般的没有明确内涵的外延。

在我看来,女性文学的质的规定性首先在于性别因素,而非题材因素。因此,男性作家对女性题材的书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据此介入女性文学,尽管他们曾经创造了并且今后仍可以创造出比出自女性作家手笔更真实、更丰满的女性形象,譬如莎士比亚的克里奥佩特拉、雨果的爱斯梅拉达、托尔斯泰的安娜、曹雪芹的林黛玉等,尽管这些“经典”的妇女形象程度极深地抵达了作为历史与社会无意识的女性经验与女性心理。

我以为女性文学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女性文

学是指女性作为写作主体的创作实践,它意味着话语权的争夺。正如李小江所指出的,中国以女性为主体的写作实践,与对这一主体位置的争取一样有着强烈的“夺权”色彩。^① 妇女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说到底是因为妇女一直被排斥在写作之外。第二,女性文学是指最先由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一种可以使妇女摆脱菲勒斯中心语言的女性写作,一种无法为既定文学传统所规范、所封闭的——然而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的异质文本。也就是说,女性文学是一种摆脱男性中心语言,赋予女性本真经验以表述形式的文学。女性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挑战性的文学行为,这种挑战从看似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的对世界的介入,它是女性对历史的进入,是对由语言给定的“后缀与从属”位置的一种反动,这种写作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即更具女性本体意味的方面是对世界的叛离,即挖掘被男权中心文化长期遮蔽的女性经验,构造出具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以实现对男权话语场的逸出,对男性意识形态的反叛。

概言之,女性文学是以女性作为自觉写作主体的,并以与男权世界抗辩作为写作姿态、以解构男权文化秩序为要旨的、表达女性独特经验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改变了并还在改变着女性作家及其文本在文学传统中的“次”类地位,体现着一种批判性的精神立场。

^① 参见李小江《新时期妇女运动与妇女研究》,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性别与中国·平等与发展》,三联书店1997年版。

第二节 女性文学的缘起及其演进轨迹

严格地说，中国大陆女性文学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女性文学这一学术概念的提出到逐渐为学界认可和接受，则是在进入 90 年代以后。这并不是说被西蒙·波伏娃称之为“第二性”的中国女性此前没有从事文学活动，而是因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其写作一方面遭致男权专制文化的忽略、贬低和抹杀，声音近乎消失；另一方面也难以挣脱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网络和美学成规的铁篱，而往往成为花木兰式的“仿写”。所以，千百年来，女性写作无法以清晰的面貌凸现于历史地表。20 世纪末东方女性特有的文化际遇，使女性文学这一新的文学门类得以浮现和命名，就此打破了男权化文学的一统天下，宣告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正式诞生。

—

女性文学在 20 世纪末的中国崛起有着多重的背景和原因。其一，经济、文化转型的多元化时代为女性文学提供了多元的生长空间。新时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对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打破了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促成了文学中

主流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三足鼎立、“共享空间”的确认。这种多元并置的格局动摇了男性文化一直占据的主导话语地位,导致了他们“从中心到边缘”的撤离。这对千百年来习惯于中心位置的男性主体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失败,是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而对于女作家而言,由于他们历来处于社会或话语的边缘,“位移”带给她们的“失落感”远不如男性精英强烈。相反,经济转型带来的意识松动、多元语境,削弱了男性精英文化清规戒律的“导引”,女作家们获得了空前自由地抒发自我和营造世界的机会与可能。对于多元话语空间的恩惠,女作家们感触良深。1994年,林白的叙写女性躯体、女性欲望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面世后,尽管惊起了大陆文坛一场辩论与动荡,作者本人遭受过种种非议和诘难,书的出版发行也历经挫折和艰难,但作者及作品,毕竟没有像以往那样,招致主流话语的封杀,历经一年多的辩论之后,即便在多数权威男性批评家那里,林白以及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都已成为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女性主义范本,难怪乎林白不无感激地表示:“只有90年代的多元化,才会有我的生长空间。”^①

其二,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本土的“新女性”文化与文学为女性文学贡献了思想理论资源。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引进、传播意义重大,功不可没。它不断给女作家以理论与创作的启迪,成为我国女性主义文学崛起的深度理论根源。80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现象、新思潮,通过先知先觉者的译介引进中国,并逐渐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

^① 张永恒:《“女性主义”文学再度引起争议》,《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2日。

域渗透。1981年,朱虹在为《美国女作家作品选》所写的序中率先介绍了美国妇女现状及女性主义思潮。1983年,她在编选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的前言中全面介绍了西方妇女文学及美国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思想和妇女研究现状,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等早期的女性主义经典。这些简略的介绍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一向耳目闭塞的中国读者见识了女性主义理论这朵异域奇葩。80年代中期以后,译介出现高潮。先是《外国文学》、《上海文论》开辟专栏重点评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创作,而后,《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批评》等权威性刊物及普通刊物纷纷推出此方面论文。接下来,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和格里尔的《女总监》等专著,玛丽·伊格尔顿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论文集,先后由国内各家出版社出版;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塞斯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阿赫玛托娃等欧美女作家创作也纷纷在中国面世。大量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译介,不仅为女性文学提供了理论的武器和创作的参照,而且营造出一种呼唤女性文学、为女性文学摇旗呐喊的赫赫声势,催促着女性文学的勃兴。90年代在西方女性主义“躯体写作”理论导引下兴起的女性躯体写作热潮,可看作以上阐释的形象说明。

另一方面,世纪之初,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新女性”文化和文学为女性文学提供了本土的思想资源。20世纪伊始,作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化先驱的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以一首《勉女

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中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表达了广大受压迫妇女争自由、求解放的共同心声。并且以身示范，为妇女做出了实际斗争的榜样。其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春雷，惊醒了睡梦中的现代知识女性。冰心、庐隐、丁玲、萧红、凌叔华、白薇等女性意识初步觉醒的女作家，纷纷站在时代的前沿，以手中之笔书写着女性解放的进行曲。这其中既有母爱亲情的赞美、平等性爱的呼唤，又有对父权专制的愤懑，对封建礼教的反叛。这些透露着女性意识的写作母题，历经七八十年的历史轮回延续至今、常写不衰，成为启发一代代女性作家创作的宝贵文化资源。

其三，女作家女性意识的觉醒、成熟，为女性文学兴起准备了良好的主观条件。我国女作家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最初觉醒是伴随着民主革命意识的觉醒而来的，表达的是与被压迫阶级男子同样的反叛封建伦理道德、反抗阶级压迫、追求人的权利的相同要求。这种反叛和觉醒的方式与西方妇女孤军作战、因各种社会压力而发生的女性自我意识的普遍觉醒有着极大的区别，它没有脱尽男性的印迹，不具备女性性别的独立意义。因此，女性的创作相当程度地表现为对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男性作家为代表的新文学的模仿，其书写的主题，如性爱自由的追求、“娜拉出走”后的困惑和困境等，与男性文学所写并无根本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后的女作家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种大而化之的男女平等，主要是女性独立奋斗、意识觉醒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赐予的。它一方面是对几千年的性别歧视史的一次深刻的颠覆和改写，但另一方面又否认了女性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性别特点的群体存在的必要。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刘慧英所言：“1949年以后我国始终在政治和经济上保障妇女的权益，给全体人民灌输‘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同样也不标志着妇女的自我觉醒和整个社会意识的提高已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种表面的权益和地位的可靠保障中非但男性意识和观念没能杜绝，妇女的自我意识也趋于涣散和退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目前西方所面临的困惑。”^①作为作家也同样如此。“十七年”文学中女性书写中反复出现的泯灭性别的“女英雄模式”，可说是女作家性别意识退化的明显例证。有批评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十七年’小说中的女英雄形象，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女战士，还是参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人，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原则都是：要想救出自己，只有从救出大家做起，献身于所谓社会的或集体的斗争……可以说，‘十七年’的新女性的‘新’就在于‘妇女必须像男性一样在公众生活中找到作为劳动者的自我实现的位置，她们走出家门之后，已不再如‘莎菲’”。

^①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第1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们那样茫然和孤独,献身于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在等着她们。”^① 写作女性及其文本中的性别意识就这样淹没于以革命名义出现的主流话语之中。

直至新时期,国家政治的转机使新一轮女性精神解放获得了契机。在人的解放的思想启蒙下,女性几近泯灭的自我意识开始复苏。不少女作家在文本中表现出对男权文化观念的强烈反抗和女性独立人格的积极追求,并以爱情为重要主题,代表当代女性发出了对情爱文明和女性特质的呼唤。她们明确表示:女人,不是月亮,不要借别人的光炫耀自己;女性的解放不能依靠别人的恩赐,要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去争取,而这种解放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地位的获得,还包括女性自我价值的全面实现。这些满怀激情的表达昭示着女作家女性意识的成熟和自觉,这种具有清醒、自觉女性意识和良好文学素养的创作主体,无疑是女性文学崛起兴盛的至关重要的内因。

上述三方面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女性文学终于成功地破土而出,并迅速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一道光彩独异的亮丽风景。

二

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尔沃特根据文学亚文化的共性,将妇女创作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女人气阶段,指

^①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82~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